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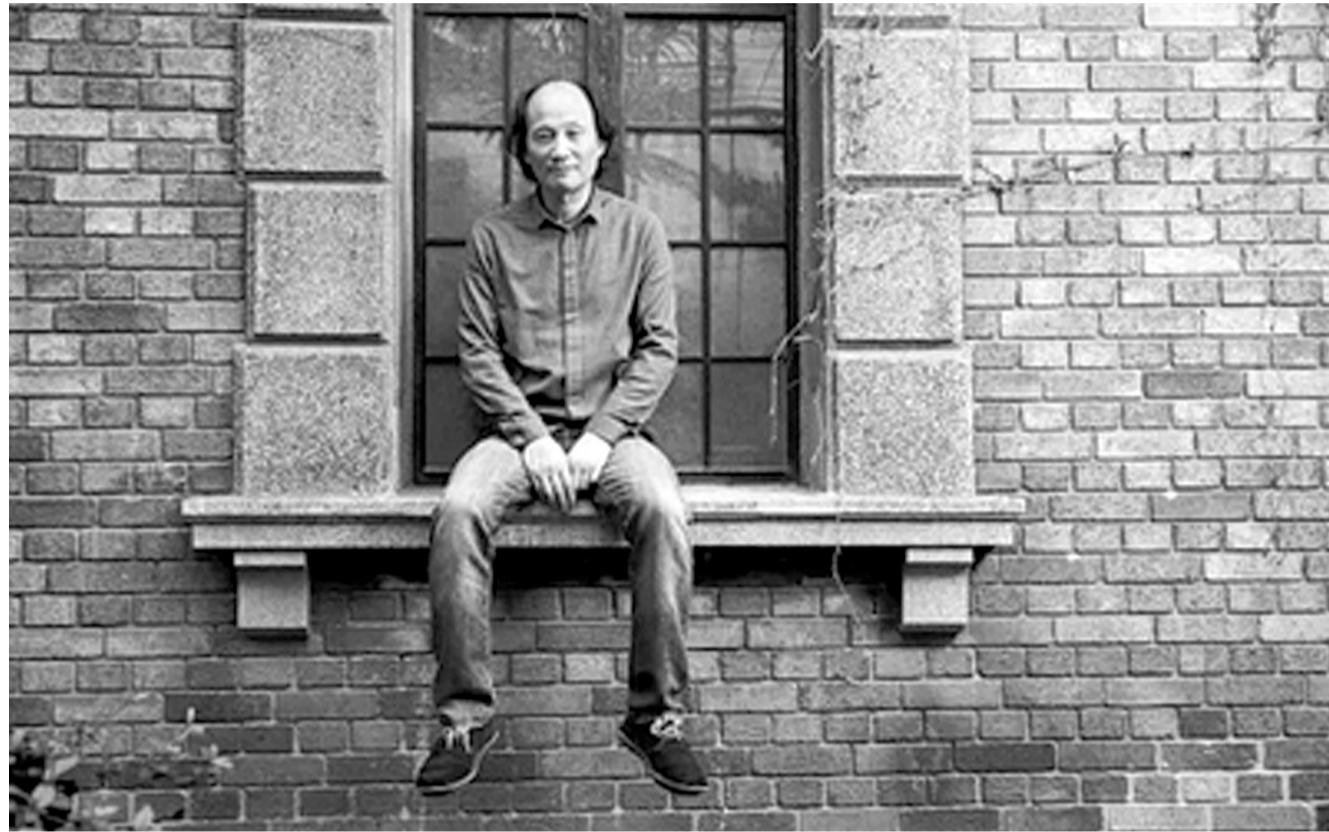
金宇澄

# 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 读者往往比作者更专业

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细化的世界。

分工越来越细化，知识越来越细化。人类的知识被切割成具体的领域或专业，丢掉了一种完整性，但阅读要求也更深且高。

金宇澄说，在这样的知识境况下，作者要打动读者，将越来越难，这世界的读者，往往比作者更专业。在他看来，读者的文化程度和阅读需求提高了，那些学贯中西、眼目清亮、行走世界的读者，更是如此。



小说《繁花》

“我确实感受到幸福”

笔者：《繁花》看了两遍，金老师您是如何保持对寻常生活的热爱？您对于社会各个阶层、各个角落的生活都有着切身的体会，带领我们回到那个时代。从小摊小贩到车间工人，从各式服装到电影明星、流行歌曲，可以说您的观察，对生活的热爱是无与伦比的。

金宇澄：年轻时代我去东北务农七年，非常向往上海，生活细节完全改变，一切从头开始，

不能随便流动，没有未来，境况难以想象，上海小青年常常把上海细节作为聊天的重要话题。

上海离东北几千公里，因为远离，却变得分外清晰，仿佛“异地恋”，因为久别，对方就更清晰，更难忘，因为得不到。这代人的共同经历，以后产生了大量的“知青文学”，后来有一种说法企图否定它的价值：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应该是更苦的——我个人觉得，这等于是讨论“先天

失明”还是“后天失明”谁更痛苦的问题。一般来说，你先是在色彩丰富的世界里生活，然后长期沉入到黑暗中，这个状态应该是更痛苦的。

笔者：如果把写作看成一个从构思到收获的过程，您是否在其中感受过幸福？此外，为什么我看《繁花》常常是看一点，停了几天后，不得不从头开始看？

金宇澄：谢谢。我确实感受到幸福，这是无意之间上帝赠予

的礼物。

建议随便看待这本书，很多读者觉得，翻开它任何一页都可以读，等到真有了兴趣，可以再从头开始读，我形容这小说是一个超市，读者可以随便选读，进入其中，你不会遇见那种老售货员，不厌其烦地为你推荐、介绍各种内容，这小说的内部，一切都由读者自己去判断。

金宇澄，《上海文学》执行主编，被称为中国小说界的“潜伏者”。他于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，著有长篇小说《繁花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迷夜》，随笔集《洗牌年代》等。

## 回顾与前瞻

“人就那么过来了”

笔者：老上海留给青春时代的更多的是幸福还是伤痛？

金宇澄：一种感怀，意义复杂。时间已经流走了，听一首过去的故事，往往只产生复杂的感怀，像每一位年长者的回忆，人就那么过来了，青春时代有没有意义？《繁花》写的就是这些内容，等于有个朋友给我看一盘过去某个聚会的录像带，哎，我完全忘记这事了，完全忘了，意思是这聚会对我的记忆是无意义的，但我一看带子，过去居然复活了，曾经的那些人和印象都复活了，引动我无数的感受，并不是幸福，也不是痛苦，这种重现，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感受。

笔者：现在很多人在说：科技向前发展，生活向后找寻。您认同这样的说法吗？

金宇澄：认同这个说法，现实主义方式的作者，需要回顾，在积淀中寻觅主题，但也有前瞻式的写作样式，幻想的主题，对未来世界做出自己的想象和判断，向迈进，写出将来的人物和背景。

笔者：身为电影工作者及文学爱好者，请问金老师与王家卫导演的合作情况如何？具体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？

金宇澄：一直在进行中，准确地说，仍然在电影大纲状态，但是今年会有进展。电影是导演的艺术，王导有很多要求，目前我只能简单地说，是停留在好事多磨的一个状态。

(本版综合)

文学的生命

文学并未终结

笔者：张爱玲为何那么推崇《海上花列传》？

金宇澄：她说“中国文化古老而且有连续性，没中断过，所以渗透得特别深远，连见闻最广的中国人也都不太天真。独有小说的薪传中断过不止一次。所以这方面我们不是文如其人的。”“但是一百年后倒居然又出了个《海上花》。

《海上花》两次悄悄地自生自灭之后，有点什么东西死了。”什么东西死了，是这部小说继承传统小说的样貌以及采用了吴方言等等，形成了“断崖”。

笔者：好久没有看文学了。想到文学的终结这个问题，人们仿佛越来越理智化、越智力化、越数字化、越能用各种科学分析替代感性思考，

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？

金宇澄：我没觉得文学有终结的迹象，只感到这个世界的信息量，越来越惊人，越来越容易让人恐慌，这个国家的读者，文化程度越来越高——本土历史上，从没涌现那么多的知识分子、出版那么多的书，有那么多学贯中西、眼目清亮、行走世界的读者，他们

兴趣越来越细化，越来越显现细微的分类，比如“多肉类植物爱好者”，内中有更多的各自分类，这在过去都是不可能的事——对于文学作者来说，应明确地知晓这越来越细化的世界，对文学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，作者要打动读者，将越来越难，这世界的读者，往往比作者更专业。

方言

“单说‘方言文学的消退’不够全面”

笔者：在小说中怎么处理方言写作的度？既能表现语言风格又不令人难解？

金宇澄：这确实是个有趣的话题，方言小说要更大程度被读者接受，作者需要把握方言语词的分寸，举例上海话的“侬”，也就是“你”，《繁花》是沪语写作思维，用这个第二人称常用词，每一页就会出现多次，不论上海/非上海读者，都是懂这个字的，但肯定不习惯，不喜欢，因此，我去了它——整部《繁花》，没有用“侬”，我做了转化，比如改成直呼其名——上海人喜欢连名带姓直呼其名，也是

很有地域特点的做法——豆瓣有读者说，怎么连名带姓啊？读者却没有发现，这本书里从不使用第二人称词。

一些不通文的方言词，如沪语“豪捐”，意即“赶快”，就应该去除、取代，改成“快一点”就达意了，上海人也这么讲——在沪语同义词里，选出让华文读者适应的词来，去掉产生歧义的词；胡适先生赞《海上花》“我手写我口”，当时人怎么说都可以全盘照搬的时代，已经过去了。

笔者：在当下，普通话教育已经贯彻到整个国民生活的各个

方面，而方言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极大的压缩。请问方言文化的消退将会对文学创作产生什么影响？您在创作过程中是否会有意识地应用方言文化？

金宇澄：因为普通话巨大的影响力，当代人对方言的辨识度，听力，是远不如前辈了，这也是张爱玲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翻译它的原因，过去方言混杂共生的语境，已慢慢过渡到了一种共同、单调的普通话环境里，原版《海上花》慢慢也就看不懂了——等于如今去到任何城市，建筑都差不多，没话语的特点了，普通话对于沟通管理是好

的，文学首先却是要讲究语言的魅力，因为读者第一时间面临的就是作者语言的特点，西方文学同样注重方言，讲究的就是“大民族语言的小民族化”，其实普通话是一种人造的语言（“以北京方言为基础”所产生的普通话），也很容易形成文字语言同质的现象，方言却是水土的自然生成，永远那么生动。

当然，单说“方言文学的消退”不够全面，北方语系的方言，北京话、东北话，陕西山西等方言的文学，完全是一直在蓬勃继续里，主要是江南语系，包括闽、粤这一范围，缺少书写者。